

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 絲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Ancient Coin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上海博物館

K865.64-53
2012/

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博物館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上海博物館編. — 上海 :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79-0310-0

I. ①絲… II. ①上… III. ①絲綢之路—古錢(考古)—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K865.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245801號

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博物館編

責任編輯 茅子良 卞建林 王 彬

特邀編輯 王 樾

封面設計 張晶晶

技術編輯 陳 凌 錢勤毅

出版發行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200050

網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epp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萬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30.5 字數 480千字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

書號 ISBN 978-7-5479-0310-0

定價 120.00元

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李朝遠 杜維善 汪慶正 周 亞 陳克倫 陳燮君

目 錄

絲路錢幣與粟特商人	榮新江	1
關於古代中國羅馬城討論的“終結”	徐文堪	8
貴霜帝國的萬神殿	林梅村	15
新疆洛浦縣山普拉墓地中的祆教因素	郭 物	28
漢文化和古代西域姓名模式	賈叢江	42
西域歷史與錢幣札記	聞 廣	57
The Bactrian era of 223 C.E. — Some Numismatic Considerations	Nicholas Sims -Williams	62
紡織品作為絲綢之路上的貨幣	汪海嵐	75
The Place of Coin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in the Silk Road Trade	Valerie Hansen	83
錢幣及其他形式的貨幣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的位置	韓 森	114
吐魯番近年來出土的古代錢幣	李 肖 張永兵 丁蘭蘭	136
新疆博物館館藏古錢幣述略	伊斯拉菲爾·玉蘇甫 安尼瓦爾·哈斯木	151
新疆近十年出土窩闊台汗國錢幣研究	石 剛	169
北魏平城波斯銀幣與絲綢之路幾個問題	張慶捷 劉俊喜	199
新疆所見絲路錢幣雜談	Stephen Album	210
旃檀忽哩 (σανδανο χοαδηο) 與天可汗 (καγανο σοι βασι) ——上海博物館藏中亞三語錢幣研究	馬小鶴	211
New Coins of the Hephthalites along the Silk Road	Michael Alram	240
New Numismatic Evidence on the Chronology of Late Indo-Greeks and Early Kushans	Osmund Bopearachchi	259

Hamadan and Marw: Two Stations on the Silk Road

New Evidence for their Administrative and Monetary History (3rd-7th Centuries AD)

.....	Rika Gyselen	284
絲綢之路上的“希臘式錢幣”.....	楊巨平	298
關於波斯薩珊銀幣在中國流通使用的若干問題.....	康柳碩	309
薩珊幣上的幾個徽記初探.....	李鐵生	324
雙語錢幣.....	劉文鎖	334
漢佉二體錢芻議.....	王 樾	347
我國所見拜占庭鑄幣相關問題研究.....	陳志强	354
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幣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錢”.....	林 英	371
錢幣銘文與喀喇汗王朝王室的祖先傳說.....	華 濤	378
伊朗伊利汗朝各階段重要錢幣的文化解讀.....	程 彤 吳冰冰 陳崗龍	379
阿拉伯文古錢與古代中國.....	宋 峴	386
洛陽發現阿拉伯金幣及其相關問題——兼論洛陽絲路錢幣與隋唐東都城	霍宏偉	388
察合台汗國錢幣之研究.....	周 祥	396
Three Notes on Türgesh Numismatics.....	François Thierry	413
“高昌吉利”錢幣考——兼論隋唐之際高昌地區的文化融合.....	王永生	443
龜茲五銖之研究.....	傅為群	461
The Bai Jin San Ping Coinage of Han Wudi: Early Influences From the Silk Road		
.....	James T. Anderson	466
後 記.....		481

絲路錢幣與粟特商人

榮新江（北京大學歷史系）

內容提要：“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文化”這個議題確實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視角，即從絲綢之路上流通的貨幣來看絲路的文化。筆者近年來一直關注中亞粟特商人東遷中國及其文化影響問題，從絲路錢幣的角度，結合絲路上的粟特商人活動，本文主要討論三個問題，希望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加強對於粟特商人重要角色的認識。

薩珊波斯銀幣不是波斯商人帶來的

從20世紀初葉以來，越來越多的薩珊波斯帝國製造的銀幣在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沿綫被發現，新疆烏恰的山間、吐魯番盆地的高昌城內，青海西寧的窖藏，寧夏固原南郊的胡人墓地，河北定縣的塔基等等，都有出土，證明了《隋書·食貨志》所說的：“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學者們一般都認同，這裡所說的金錢是指東羅馬（拜占庭）金幣，而銀錢就是薩珊銀幣。從目前考古已經發現的資料看，東羅馬金幣尚不能說是一種流通的貨幣，而薩珊銀幣則肯定進入流通領域，這一點得到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國到唐西州時期的大量公私文書記錄的印證。

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絲綢之路沿綫大量發現薩珊銀幣的時候，學者們當然立刻會把這種錢幣在中國的出土和古代波斯與中國的交往聯繫起來。^[1]然而，到70年代吐魯番出土官私文書逐漸被解讀出來以後，人們發現實際上在絲綢之路上使用這種薩珊銀幣的不是波斯人，而是粟特人。這個結論現在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但為什麼薩珊銀幣不是波斯商人帶來的呢？

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中國傳統文獻、出土文書和碑誌的相關記載，發現在北朝隋唐時期，來華的波斯人主要是肩負外交和政治使命的使者，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人。與之相反，中亞兩河流域的粟特人，從公元4世紀初到公元8世紀上半葉，在中亞到中

國北方的陸上絲綢之路沿綫，建立起了完善的商業販運和貿易的網路。於是，薩珊波斯的商人就很難插足其間，來爭奪中亞和中國的商業利益了。^[2]我們從吐魯番留存的大量麴氏高昌國時期（501—640）和唐朝時期的文書，可以看到粟特商人在高昌地區從事商貿活動的真實寫照，但卻沒有任何波斯商人的身影。^[3]現代舞劇《絲路花雨》把波斯商人當作絲綢之路上商人的代表，其實是對於吐魯番文書尚未研究時代的產物。過去我們對於波斯商人和粟特商人來華活動的情況不是非常清楚，由於大量的考古發現，特別是敦煌吐魯番文書和石刻碑誌的整理研究，使得我們現在對於北朝到隋唐時期粟特商人控制絲綢之路的情形有了充分的瞭解。同時我們也知道，波斯人在陸上的損失，大概從海上獲得了部分的補償，這就是我們從漢文史料和筆記小說中常常看到波斯商人或他們所開設的店鋪，更多的是在東南沿海一帶。因此，現在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陸上絲綢之路沿綫發現的薩珊銀幣，主要的持有者不是其原出國波斯的商人，而是中亞的商業民族——粟特人。

粟特商人貿易網路的建立與絲路貨幣形式的統一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caravan）的形式，由商隊首領（caravan-leader）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他們在絲綢之路上的一些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點留居下來，建立自己的殖民聚落，一部分人留下來，另一部分人繼續東行，去開拓新的經商地點，建立新的聚落。久而久之，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變強，少的幾十人，多者達數百人。在中原農耕地區，被稱為聚落；在草原遊牧地區，則形成自己的部落。因為粟特商隊在行進中也吸納許多其他的中亞民族，如吐火羅人、西域（塔克拉瑪干周邊綠洲王國）人、突厥人加入其中，因此不論是粟特商隊還是粟特聚落中，都有多少不等的粟特系統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衆。所以，我們把粟特聚落有時也稱為胡人聚落，可能更符合一些地方的聚落實際的種族構成情況。

從十六國到北朝時期，這樣的胡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區都有存在，散佈十分廣泛。近年來，我彙集了粟特文古信劄、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粟特文文書、中原各地出土的漢文墓誌材料等等各種史料，比較清晰地勾勒出一條粟特人東行所走的絲綢之路。這條道路從粟特本土出發，經怛邏斯、碎葉、弓月到北庭，或是沿西域北道的據史德（今新疆巴楚東）、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伊州（哈密），或是從勃律、渴盤陀，沿西域南道的于闐（和田）、且末、石城鎮（鄯善），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再東

南經天水、原州（固原），入長安（西安）、同州、洛陽，或東北向靈州（靈武西南）、夏州（統萬城）、并州（太原）、雲州（大同東）乃至幽州（北京）、營州（朝陽），或者從洛陽經衛州（汲縣）、相州（安陽）、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縣）、幽州（北京）可以到營州。另外，還有經西平（鄯州，今西寧）南下吐蕃之路，以及從并州南下介州的南北道路。在這些道路上的各個主要城鎮，幾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4]

所以，粟特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在從粟特本土到中國的絲綢之路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路，在這個貿易網路的交會點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為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吐魯番出土有高昌國時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區進行貴金屬、香料等貿易的雙方，基本都是粟特人。^[5]也就是說，從西方來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貨物運載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買下來，再分散或整批運至河西或中原地區興販。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教授曾據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側發現的粟特文岩刻題記，指出粟特人不僅僅是粟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擔當者，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擔當者。^[6]結合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發現的粟特文買賣突厥地區奴婢的契約，^[7]我們也可以說，粟特人還是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貿易的擔當者，即如姜伯勤教授所強調的那樣，粟特人實際上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8]總之，從北朝到隋唐，或者說從4世紀到8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幾乎被粟特商人所壟斷。

我曾經把上述粟特商人的殖民據點繪製在地圖上，^[9]在上面列舉粟特人曾經駐足的絲路城鎮名字時，已經對這張圖做了補充。如果我們把這張圖和薩珊波斯銀幣出土地的標識圖合起來看，就會一眼看出兩者基本上是吻合的，不論從時間上，還是從地域上看，粟特商人是薩珊銀幣東傳的主要承載者。

在4世紀以前，絲綢之路上的錢幣多種多樣，有漢的五銖和中原漢晉時期作為錢幣使用的織物，有漢佉二體錢、漢龜二體錢、高昌吉利錢等西域地方王國的貨幣，有貴霜銅幣等流通。^[10]隨着4世紀初葉以後粟特商人貿易網路的逐漸建立，薩珊銀幣取代其他各種貨幣，成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等價物，因為吐魯番、敦煌等地的材料較多，所以我們知道當時不僅國際貿易使用薩珊銀幣，而且深入到地方王國如麴氏高昌社會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如納稅、買賣、雇傭等；^[11]北魏王室派到敦煌的統治者元榮，就用銀幣大量施捨。^[12]《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在河西重鎮涼州（武威）為道俗講《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錢、口馬（奴隸和牲口）無數，法師受一半然（燃）燈，餘外並施諸寺”。^[13]到7世紀末、8世紀初，隨着薩珊波斯的滅亡、粟特本土逐漸被阿拉伯人佔領、唐朝勢力的進入西域

地區，粟特原有的貿易網路逐漸無法維持，薩珊銀幣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絲綢之路的東部開始流行唐朝的銅錢和布帛，西方則用阿拉伯仿製的阿拉伯—薩珊銀幣或阿拉伯金幣^[14]。

可以說，粟特貿易網路的維持時間和分佈地域與薩珊波斯銀幣的流行時間和範圍，大體上是相吻合的。

波斯薩珊銀幣的流通貨幣功能

考古發現畢竟是偶然的，迄今所發現的波斯薩珊銀幣也就兩千枚左右，與當年繁盛的絲綢之路上的國際貿易相比，這些錢只是滄海一粟，算不得什麼。於是，在討論薩珊銀幣的貨幣功能時，常常會有學者把薩珊銀幣和東羅馬金幣同樣看作是一種放在嘴里的喪葬物品，或者像何家村窖藏那樣是一種收集品。事實上，有材料證明薩珊銀幣是一種流通領域里的貨幣。

1959年，在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烏恰縣一個山崖縫隙間，曾發現947枚波斯銀幣、16根金條，這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商人遇到強盜時緊急掩埋的結果。^[15]烏恰位於中國通向費爾干那盆地的通道上，應當也是中古時期粟特商人所走的道路之一。雖然沒有確切的材料證明這些銀幣和金條屬於粟特商人，但它的發現地點在粟特與中國之間的道路上，發現於粟特商人壟斷絲綢之路貿易的時代，我們不是沒有理由把這個發現和粟特商人聯繫起來的。^[16]

這個發現的重要意義在於，這九百多枚薩珊銀幣是一次性發現的，而且是和16根金條一起發現的，這些錢幣當然只能認為是作為流通的貨幣來看待，而金條則是這批商人所得財富的濃縮物。

其實，性質相似的窖藏不止這一處，吐魯番的高昌故城城內，曾先後發現三處窖藏，1950年左右發現20枚，出土時放在一起，原本應當屬於一個窖藏；^[17]1955年在一個煤精製成的小方盒中發現10枚；^[18]1989年在一個容器內發現100多枚，可惜已經散入民間；^[19]青海西寧城隍廟街發現一窖藏，出土76枚。^[20]以上所發現的錢幣製作年代都在4-5世紀。1991年河南洛陽伊川縣司馬溝村一木製方盒內，發現一批薩珊銀幣，已經散失，收集到的資料尚有315枚卑路斯（Peroz，459-484）錢幣。^[21]1988年山西大同天鎮縣新平鎮長城邊一山洞內，發現49枚卑路斯錢幣。^[22]這些窖藏與墓葬、塔基出土的單個或少量銀幣不同，應當是作為錢幣有意埋藏起來的，由於某種原因而沒有能再度啓用。其實，這種薩珊銀幣的功能，才是這種銀幣在中國流行的主要價值。^[23]

由烏恰的事例我又想到，一隊粟特商人在進行長途販運時，所攜帶的物品應當是

體積既小而價值又高的東西，那麼金條和銀幣，可能就是他們用以購買絲綢和其他物品的主要貨幣，當他們到達一個絲路城市後，就可以按照當地的比價換成當地的貨幣或絲綢，或者直接用作錢幣來購買所需物品。我曾根據近年發現的粟特首領史君、安伽及其同類型的墓葬出土的圖像材料，探討過粟特商隊的種族構成、運載工具、運行方式等^[24]。在我舉證的安伽和史君墓出土的商隊圖像中（圖一、圖二），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商人背負着一個裝着東西的袋子，裏面沉甸甸的樣子，即使是在商隊休息的時候，這位站在中間的商人肩上，仍然背着而不肯放下，這不禁讓我們想到，這裏粟特人要表現的是什麼呢？我猜想這可能正是他們辛辛苦苦奔波在絲綢之路上所賺來的薩珊銀幣。



圖一 安伽石屏粟特商隊休息圖



圖二 史君石槨粟特商隊休息圖

讓我就用這樣兩幅大概是描繪絲綢之路上背着錢袋的粟特商人形象，來結束本文的討論。不當之處，敬乞方家指正。

注釋：

- [1] 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第97頁；桑山正進《東方におけるサーサーン式貨幣の再検討》，《東方學報》（京都）第54冊，1982年，第149-151頁；E. V. Zeimal, "Eastern (Chinese) Turkestan on the Silk Road - First Millennium A.D. Numismatic Evidence",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 1991/1992, pp.166-167；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1頁。
- [2] 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劉東編《中國學術》2002年第4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61-64頁。
- [3] 參看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198-202頁；榮新江《高昌王國與中西交通》，余太山編《歐亞學刊》第2輯，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3-83頁。

- [4] 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馬大正等編《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72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5頁；兩文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9-36頁、第37-110頁；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1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補考》，《歐亞研究》第6輯，中華書局，待刊。
- [5] 朱雷《麴氏高昌王國的“稱價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期，1982年，第17-24頁。
- [6]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 A. Cadonna e L. Lanciotti, Firenze 1996, pp.45-67.
- [7] 吉田豐、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館《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賣買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1988年，第1-50頁，圖版一；Y. Yoshida, "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Purchase of a Slave Girl found at Turfan and dated 639", (Appendix to Hansen, V.), *T'oung Pao*, LXXXIX/1-3, 2003, pp.159-161.
- [8] 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150-226頁。
- [9]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第39頁。
- [10] Helen Wang, *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4, pp.47-74.
- [11] 參看鄭學稼《十六國至麴氏王朝時期高昌使用銀錢的情況研究》，《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318頁；宋傑《吐魯番文書所反映的高昌物價與貨幣問題》，《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第67-76頁；郭媛《試論隋唐之際吐魯番地區的銀錢》，《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9-33頁；林友華《從四世紀到七世紀中高昌貨幣形態初探》，《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872-900頁；盧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貨幣關係演變述略》，榮新江《敦煌吐魯番文書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17-266頁；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29-36頁。
- [12] 池田溫《敦煌の流通經濟》，《講座敦煌》3《敦煌の社會》，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第310頁。
- [13] 孫毓棠、謝方點校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11頁。
- [14] J. K. Skaff, "The Sasanian and Arab-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 *Asia Major* 11, 1998, 67-116；斯加夫《吐魯番發現的薩珊銀幣和阿拉伯—薩珊銀幣——它們與國際貿易和地方經濟的關係》，《敦煌吐魯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463頁。
- [15] 李遇春《新疆烏恰發現金條和大批波斯銀幣》，《考古》1959年第9期，第482-483頁。詳細報告，見奈良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ンター編《新疆出土のサーサーン式銀貨——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區博物館藏のサーサーン式銀貨》，《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第19號，奈良，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
- [16] 孫莉《薩珊銀幣在中國的分佈及功能》有這樣的看法，《考古學報》2004年第1期，第39頁。在2007年4月3-4日在日本滋賀縣立大學舉辦的“中日共同粟特文化研討會”上，主持整理烏恰出土銀幣的菅谷文則教授提出《葱嶺道與粟特人》的報告，根據他對出土地及其與周邊道路交通情況的實地調查，詳細論證了這個發現與粟特人的關係。
- [17] 夏鼐《新疆吐魯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原載《考古》1966年第4期；此據《夏鼐文集》，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9-40頁。
- [18] 夏鼐《中國最近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原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此據《夏鼐文

集》，第19-24頁。

- [19] 宋智勇《波斯銀幣在新疆的又一次重大發現——綴記89年吐魯番出土的一批波斯薩珊朝銀幣》，《新疆錢幣》1996年第2期，第36-39頁；《吐魯番地區發現一批早期波斯銀幣》，《中國錢幣》1996年第4期，第74頁。
- [20] 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原載《考古學報》1958年第1期；此據《夏鼐文集》，第32-38頁。
- [21] 于倩、霍宏偉《洛陽出土波斯銀幣探索》，《中國錢幣》1995年第1期；范振安、霍宏偉《洛陽泉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62頁。
- [22] 張慶捷《北魏平城波斯銀幣與絲綢之路幾個問題》，“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上海博物館，2006年12月4-7日。參看王銀田《北朝時期絲綢之路輸入的西方器物》，張慶捷、李書吉、李鋼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 [23] 我這裏強調的是流通貨幣功能，對於薩珊銀幣各種功能的全面闡釋，參看孫莉《薩珊銀幣在中國的分佈及功能》，第43-50頁。
- [24] 榮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文物》2005年第3期，第47-56頁。

關於古代中國羅馬城討論的“終結”

徐文堪（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內容提要：已故英國漢學家德效騫(H. H. Dubs)在其著作中試圖證明，公元前36年之後的某個時候，約145名羅馬軍人被中國將領陳湯從中亞帶回中國，這些羅馬人獲准於張掖郡建立一縣，並用羅馬一亞歷山大里亞的中文稱謂命名，是即驪軒縣。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漢學家肯曼(Schuyler Cammann)教授和余英時先生先後發表評論，指出其說之不可信從。

至1989年，中國、澳大利亞和蘇聯的一些學者，又聲稱在中國西部發現可能是羅馬兵士後裔所建的“白人聚落”，引起國內外媒體廣泛關注。近十餘年來，圍繞羅馬人建城之事，也有海峽兩岸中國學者著文立論，對此予以探討，其中雖然不乏嚴肅的、學術性的反駁，但國內外報章至今仍不斷有相關報導，一般都傾向為實有其事。

本文綜述前人和時賢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對上述德效騫、肯曼、余英時、邢義田諸氏的論著予以評論，並結合中亞考古和古代文明研究的新成果，說明今後若無其他新證據，則近70年來關於中國西部羅馬城的爭論即可宣告“終結”。

關於古代中國與羅馬世界的交往的歷史，百餘年來中外史學家已經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探討。^[1]近年來的考古發掘也提供了新的物證。^[2]早在1941年，英國漢學家德效騫就在《美國語文學學刊》上發表論文，^[3]認為公元前1世紀中後期幫助匈奴郅支單于守城、抵禦漢西域都護府副校尉陳湯進攻的士兵中有羅馬軍隊的殘部，戰敗後成為陳湯俘虜，被送到漢代的邊郡建立驪軒縣。至1957年，德氏又出版題為《古代中國的羅馬城》的小冊子，^[4]對此進行了進一步論證。到了上世紀60年代，美國漢學家肯曼和余英時先生先後發表評論，^[5]指出其說不可信從。應該說，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到這時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結論。

但是，從1989年開始，中國、澳大利亞和蘇聯的一些學者，又聲稱在中國西部發現可能是羅馬兵士後裔所建的“白人聚落”，一時引起國內外媒體廣泛關注。澳大利亞教師大衛·哈里斯（David Harris）除在甘肅當地進行調查外，還親赴羅馬、大馬士革、莫斯科、塔什干等地，企圖追尋和查證文獻上所說羅馬殘部停留的地點與留下的遺跡，並將其結果寫成專著^[6]。至于現在驪軒城所在的甘肅永昌縣，不但塑像建碑，每逢節慶，還舉行羅馬士兵的化裝遊行以及所謂“魚鱗陣”表演，以此創造“旅遊資源”。近十餘年來，國內外報章、電視、廣播等仍不斷有相關報導，一般都傾向為實有其事。

媒體的宣傳和炒作也激發了學者的聯想，如以翻譯希臘和羅馬古典著作聞名的王以鑄先生，在為《古羅馬風化史》中譯本所作的序言里，曾經這樣寫道：^[7]

當時條件的限制使羅馬和漢帝國未能建立關係，羅馬只從傳聞中知道東方有個產絲的國家……當時中國通西域的使者最遠也只到達西亞，沒有到巴爾干半島的記錄，更不用說意大利了。但是從不久前的報紙上我們得知我國西部腹地發現了一個白人聚落，據說他們可能是公元前53年羅馬將領克拉蘇（斯）東征帕爾提亞（我國歷史上叫安息）慘敗之後流落到中國的他麾下羅馬士兵的後裔。克拉蘇斯戰敗陣亡後，西方的史籍再也沒有提及他的部下的下落，只知道他們消失在東方的大漠裏。如果有關史學界把這事的來龍去脈弄清，這實在是是我國和古羅馬的一段稀有的姻緣！

同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多位中國學者著文立論，對此“發現”進行探討，以嚴肅的、科學的態度反駁了上述說法，其中尤以臺灣史語所邢義田先生在1997年和2005年發表的兩篇論文最為重要。^[8]

羅馬史料無法證實 克拉蘇軍隊的殘部曾協助郅支單于守城

公元前54年，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率領七個羅馬軍團進攻安息，下一年即公元前53年羅馬軍隊與安息軍隊遭遇於卡爾萊（Carrhae，在今土耳其Harran附近），羅馬軍隊潰敗。克拉蘇率領的羅馬士兵總數約為四萬人，據說有二萬人被殺，一萬人被俘虜。對這一萬戰俘的命運所知甚少，老普林尼（G. Plinius Secundus，A.D.23—79）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提到，克拉蘇戰敗後，羅馬俘虜被安息王歐羅笛斯（Orodes）發遣至馬爾吉亞納（Margiana）以防衛安息帝國的東部邊界。無疑有許多戰俘死於長途跋涉之中，究竟有多少羅馬士兵到達馬爾吉亞納並不清

楚。賀芮斯（Horace）的《詩歌》曾說到那些克拉蘇的殘部和“蠻族”女子結親，為敵人安息王服務。至于德效騫說有部分羅馬士兵後來又更向東到了都賴水（塔拉斯河）上的單于城，無論羅馬或中國史籍都未見任何記載。

羅馬步兵擅長的“龜盾陣”等與《漢書·陳湯傳》所記的“魚鱗陣”和“重木城”是兩回事

公元前36年，由於匈奴郅支單于侵擾烏孫，殘殺康居民衆，輕侮漢使，陳湯在西域都護甘延壽支持下，假傳漢元帝詔旨，徵發周圍十五國兵及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卒，共四萬餘衆，分南北二路西進，征討郅支單于。漢軍抵康居後，聯絡康居不滿郅支單于的貴族作為內應，甘延壽、陳湯率大軍攻克單于城，斬殺郅支單于及其支持者。關於這次戰役，《漢書·陳湯傳》記錄了攻郅支城的情況：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陣（顏師古注：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意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這裏對戰爭場面的描述頗為生動。早在1938年，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J.L. Duyvendak）就已發表一篇論文^[9]，根據《漢書·元帝紀》的記載，謂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認為這裏所記“圖書”的“圖”，應是山東孝堂山石祠西壁的胡漢交戰圖。這種形式的交戰畫像不同於中國本身繪畫傳統，可能出於從康居或粟特（Sogdiana）俘虜的中亞藝匠之手。但他沒有說到這與卡爾萊戰役以及羅馬戰俘的關係等事。德效騫却從中受到啟發，將陳湯誅郅支的文獻描述和圖畫、羅馬俘虜以及置驢軒縣等都作了聯繫，從而提出一連串推論。

德效騫依希臘學大家塔恩（William Tarn）的提示，以為這“魚鱗陣”就是羅馬的“龜盾陣”（testudo），“重木城”就是羅馬人用的palisades（他把“重木城”英譯為double palisade of wood）。但根據邢義田先生的研究，羅馬的龜盾陣，既有文字記載，也有圖拉真和馬可·奧利留紀功柱上的浮雕為證，可以明確地知道是在進攻或退却時，士兵把所持的盾牌密集地連在一起，不留空隙，並把相接的盾牌舉於頭頂，以遮

擋敵人的箭和矛的攻擊。而魚鱗陣只見於《漢書·陳湯傳》，其陣式和來歷均無可考，故與龜盾陣實無可比性。至于“重木城”，依《漢書》文義似是一種土城之外的木構的多重防禦工事，與羅馬人置於要塞壕溝外或閘前的尖木樁和有倒鈎的鐵刺等防禦設施根本是兩回事。

德效騫還接受了戴聞達教授的意見，認為前引《漢書·陳湯傳》中對郅支城一戰的描寫，就是根據陳湯所繪的戰役圖。而陳湯之所以用圖畫來描繪自己的戰功，則是由於擊敗郅支、虜獲羅馬士兵之後，從他們那裏聽說了羅馬人如何在戰鬥勝利後舉行凱旋式，不免受到影響的結果。其實，正如邢義田先生所指出，如果稍一比較羅馬凱旋式進行的方式和孝堂山胡漢交戰圖所表現的內容，兩者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凱旋式的特色在於展示戰利品和突出戰車上戴桂冠的將軍，孝堂山交戰圖所描繪的以胡漢騎兵的對陣廝殺和獻俘為主，兩者明顯不同，實在無從關聯。

大衛·哈里斯在中亞的追尋一無所獲

澳大利亞教師大衛·哈里斯經過一番努力，根據原西北民族學院關意權教授給他的一份地圖，來到永昌西南的“者來寨”進行了調查，據說找到了一些木製品和長約百餘公尺的殘牆以及一些花紋像是漢陶的殘片。但這些“發現”完全無法證明是漢代的遺留，更不要說是建驪軒城的羅馬人的遺物了。

為了尋找更多的證據，哈里斯又飛往羅馬、大馬士革、莫斯科等地，均毫無所獲。在塔什干，他拜訪了曾在木鹿（Merv）從事考古發掘二十多年的學者Zamira Uzmaiova，其老師是蘇聯著名學者馬松（Masson）教授（曾在木鹿附近率領考古隊進行發掘工作並繼續深入研究，前後達四十年）。按德效騫的理論，有些卡爾萊之役的羅馬殘部正是被拘禁在木鹿，其中一部分又從木鹿逃到匈奴郅支單于的王庭。但Uzmaiova女士明確告訴他，這裏沒有他要尋找的羅馬人的證據。然後，他又請教了著名考古學家Edward Rtveladze。Rtveladze教授打開中亞地圖，指出木鹿以東一千公里內曾有羅馬遺跡的地點，並出示遺跡的檔案照片，從中找到阿富汗邊界Keleft附近一處洞穴上刻寫的拉丁文銘記。拉丁銘文意義不明，但其中有Girex一字，是羅馬第十五軍團（XV Apollinaria）的名字。哈里斯頗為興奮，相信這是安息人確曾將羅馬俘虜送往中亞的一項證據。但實際上，第十五軍團是奧古斯都（前27—14）所組建，其名稱源自羅馬主神阿波羅（Apollo），即奧古斯都的保護神；而在公元前53年的卡爾萊之役和前36年陳湯敗郅支之戰時，該軍團還根本沒有成立。

為了查證郅支城，哈里斯又到了可能是郅支城所在附近的阿拉木圖。當地的